网络出版时间：2019-01-22 10:23:45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7.1477.d.20190120.2048.004.html

·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性别理论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石红梅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性别理论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依时间顺序可以划分为 1978～2000 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性别理论逐步形成阶段和 2000 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性别理论不断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中众多思潮交互影响，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妇女/性别理论图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性别理论要注重吸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关注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发展脉络中的马克思主义因素，对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妇女解放理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妇女解放理论进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性别解放理论。

关键词：改革开放；妇女/性别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9)02-0011-0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妇女/性别理论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依时间顺序可以划分为 1978～2000 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性别理论逐步形成阶段和 2000 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性别理论不断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中众多思潮交互影响，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妇女/性别理论。

一、1978～2000 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性别理论逐步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界表现活跃，妇女/性别理论研究也呈现出非常活跃的局面。但这一时期中国妇女/性别学研究面对众多西方女权主义思潮，更多的是解读、引证、评价，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女性所面临的新的问题和疑惑，我们还缺乏科学分析和理论概括，整体来说，妇女/性别理论研究显得被动和消极。因此如何对本国现实生活中女性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有效的理论指导，如何根据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和现实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妇女/性别理论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妇女/性别理论研究受到以下多种思想的影响。

（一）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第二波女性主义兴起于 1960 年代，旨在解决两性平等问题。在政治权利保证的前提下，其把目光投向了制约女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出现不平等的影响因素。1970 年代末第二波女权主义者更加注重差别，特别注重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别，并注重表达女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别强调以个体为单位评价女性的能力和发展。这些思想与新自由主义思想相契合，并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变革而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

收稿日期：2018-12-24
基金项目：厦门大学"'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资助项目"资本逻辑视域下家庭劳动分工与社会再生产理论"（项目编号：2018S001）
作者简介：石红梅，女，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妇女/性别研究。

的各个层面。在这种情境下,1980 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关于整体的阶级的分析问题的方法,注重女性经济参与和经济独立的解放途径越来越被冷落。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妇女/性别理论出现了一些倾向,具体表现为:一是注重差异。研究者们开始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抹杀性别差异的所谓的绝对平等。我们开始重视女性的生理特征差异和社会特征差异,并提出要有“女性意识”,但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对“性”的自由解读和实践却使这个富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女性意识倡导,不断地进入到一个对性的“自然化”取向中,并受到市场、资本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将女人与消费、女人与商品化建立了联结。二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得以彰显。改革开放后,新自由主义、当时流行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不断地强化个人的言说,而注重个体女性身体的思想潮流也使得与女性主义相关的理论越来越重视个体的作用。个人、主体个人的生成成为了 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而整体、集体这样的单位和概念,逐渐被人们在进行价值和行动选择时置于次要位置。三是文化批判占据了主场。1980 年代的妇女研究中把性别从阶级中剥离出来,强调文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和作用,而对于由性别中的经济要素引起的差别则有点避而不谈。在这一时期我们也发现,妇女/性别理论的研究对象更加注重的是知识女性和精英女性群体,对于广大劳动妇女的关注度不够。

(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推进

历史总有惊人的巧合,改革开放后,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时间竟然是一致的。围绕着筹备 1995 年的“世妇会”,西方“社会性别”(Gender)理论开始大规模在中国传播。在 1990 年代后许多中国学者都运用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和研究中国妇女理论和实践问题,还出现了社会性别理论,可以说社会性别主流化话语是近 30 年来中国学者进行性别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

社会性别理论认为,女性研究要研究影响女性的社会文化因素。基于此,许多女权主义理论不断从文化观念的层面去寻找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也从社会文化和观念的改变层面去寻找妇女解放的路径,认为在意识形态和观念层面的变革远远大于女性在经济基础领域的参与和改变。这样一来,女性主义寻找解放的路径就发生了微妙的转向,即从经济基础角度进行的突破转向了文化观念的转变和文化身份的认定。

社会性别理论注重人的多样性分析,特别关注社会中人们多重角色和多重身份的现状及其背后的原因,对于社会中少数族群、同性恋群体的话语予以关注并进行相关研究。社会性别理论中文化、习俗等因素的研究可以丰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加具体化。但过分关注个体的差异性所形成的身份政治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妇女作为一个比男性相对弱势的整体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谈判的可能性。而对于父权制等制约男女平等的因素,不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把它看作是与资本主义制度共存的制度去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和女性的生存状况,而仅仅将之视为一种文化观念的权力继承,从而也就失去了马克思所说的“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这一重要认识的基础[1],妇女/性别的研究转而成为精英女性群体意识和观念的表达。

(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挑战关于解放和理性的宏大叙事,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后现代主义认为不存在普适性的人权,所有的人权都有文化和历史的意义的特殊性,都有着特殊的视角和立场。后现代主义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还提供了一种选择:局部的、区域性的理论和实践。一种考虑具体情境的具有特色的社区模式在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中不断萌生。

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放大对性别差异的重视,并进一步研究差异产生的文化原因。它认为个人的观念是不稳定的、矛盾的,是由社会建构的;社会背景塑造知识,意义是由历史和语言造成的;主体不是一致的、有理性意识的,而是由话语建构的。后现代主义质疑宏大叙事,主张权力

的生产性,挑战和批判绝对真理说,后现代主义认为性别是流动的、不确定的。其理论有时空限制的历史的分析带给我们许多启示,关于权力生成和权力作用的研究和探讨,使众多的女性主义者想发明女性的话语,话语力量变得空前的重要。但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妇女/性别理论最重要的挑战是解构,它解构整体,解构宏大叙事,解构概念本身,这使得实现包括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目标的具体途径和理论建构变得非常艰难。

(四)激进女性主义的影响

激进女性主义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为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它认为现存社会的男权制的统治不仅限于公领域,而且还存于私领域。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男性是对立的,所有的女性因其共同利益联合起来,性别超越种族和阶级,女性成为姐妹形成联盟,为自己的利益和解放共同斗争。男性与女性不同的特点被认为是压迫的原因,所以激进女性义者对制约女性发展的生育问题、性问题非常关注,认为避孕技术、试管婴儿、人工授精及无性繁殖这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女性获得解放的重要手段,只有这些生理的特征通过系列的手段解决,女性才能改变自己受压迫的地位。在激进女性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的性别平等议题和进程有了明显的进步。其反抗的方式、斗争的力度和强度都在不同的领域和侧面有所体现。但激进女性主义认为,女性的解放不能融入资本主义社会中求得,也不能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来实现,他们主张女性从社会中分离出去。

(五)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提出

1978 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人们解放思想,越来越重视个体价值的实现。妇女/性别理论也从重视国家和组织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中不断剥离出来,妇女/性别理论研究的对象越来越明确,表现出独立化、专业化、学科化特点。

1990 年 3 月 7 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80 周年的纪念大会上作了题为《全党全社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重要讲话,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并对它的内涵和内容作了具体的阐释,认为“马克克思主义妇女观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妇女的社会作用、妇女的社会权利和妇女争取解放的途径等基本问题作出的科学分析和概括”[2]3。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主要领导对中国的妇女问题所作的第一次系统阐述,表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在理论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础是唯物论和辩证法,它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把妇女压迫和妇女解放的命题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重视历史的和辩证的分析,认为妇女受压迫具有整体性、阶级性和历史性的特点,强调经济对政治、思想文化的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充分肯定妇女对人类发展所起的作用和所作的贡献,认为全社会要尊重妇女、保护妇女。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下,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理论和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关于女性自身解放和阶级、民族解放的关系、公私领域中性别分工状况、家务劳动对劳动者和劳动生产力的意义以及妇女解放的具体路径等都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探讨。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后,中国妇女/性别研究中无论是社会性别主流化、后现代女性主义还是激进女性主义都受到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强烈影响,在本质上说是裹挟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在全球化条件下的蔓延而产生和发展的。就中国来讲,影响妇女/性别理论的思潮中还有近现代以来形成的独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应该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性别理论的形成受到多种思潮的影响,而面对未来,中国妇女/性别研究则表现为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社会性别主流化、激进女性主义的反思,以及对重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期待和发展。

二、2000 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性别理论不断发展

20 世纪中国的妇女/性别理论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第一个时期具体表现为以国家、民族和阶级的解放和发展共同推

进的妇女解放运动,其中包含着对制约女性主体发展的封建的“三从四德”的摒弃,也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吸收和符合中国情境的发展;后面一个时期是在改革开放后,妇女/性别研究越来越重视女性个体及其主体性。1980 年代以来,中国的妇女/性别理论研究者们更加注重关于性别的研究,而对阶级和整体相关的概念有所忽略,研究者们也更加注重自下而上的所谓女性的主体性生成的运动形式,而较少思考自上而下的妇女解放运动对女性主体性生成的作用。研究者们通过批判“铁姑娘”这种忽视女性性别差异的历史来建构“有性人”。这段时间的理论研究,表现为对个体的尊重,对差异的关注,倡导个性自由和市场竞争,与 1980 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的精神不谋而合。而 1990 年代的妇女/性别研究则不断强调女性多样性和文化身份的重要性,运行在身份政治轨道里,被消费主义吸收和利用。应该说,自 1978 年改革开放开始的近 20 年的中国妇女/性别理论的研究重视女性个体和个体的主体性,但对于宏观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对于女性整体力量的联合、对于劳动妇女所面对的现实生活和存在的问题却越来越忽略。女性主义者一直沉浸在对自我的不断认识、反思中,却失去了对整个宏观的社会制度的研究和批判。也就在此时,中国在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的过程中,公领域和私领域的划分越来越明显,政府和企业不断从私领域的家务劳动和再生产活动中退出,而这些职能退回到家庭后更多地落在了女性的身上,女性在公领域不断打拼,在私领域也要全力地承担,女性的生活质量堪忧。就全球来看,还表现为精英女性雇佣贫困女性从事家务或其他简单重复低层次的劳动,女性内部形成了不同程度的分化。

21 世纪以来,中国许多学者包括从事妇女/性别理论研究的学者,把研究的重点重新拉回到资本的视域,他们对女性发展进程中的经济因素、人们生产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越来越重视。妇女的生产劳动备受关注,人们也看到了市场对女性就业带来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与女性参与再生产活动与家务劳动密不可分。尤其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当我们把妇女的生存和发展与全球的市场联结在一起进行研究时发现,我们要对市场体制给女性带来的伤害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是在一个联系的链条中展开的,学者们重新捡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资源,在妇女解放的事业中,越来越认同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妇女解放事业中的指导地位。一种新的建设性的女性主义理论呼之欲出。中国女性主义者正在积极地面对女性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不断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宝贵的资源,也充分地研究西方女性主义者对信息化时代下所进行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政治空间正在形成。

回应改革开放后中国妇女实践运动的发展,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应当面向自身实际,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1999 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的彭珮云同志,在中国妇女理论研讨会上提出要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体系的建设。全国妇联先后于 2002 年 7 月和 9 月在安徽黄山和吉林长春分片召开了全国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研讨会。2003 年,在全国妇联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课题组,课题组设立了与经济、社会、妇女组织、全面小康、先进生产力、先进性别文化等与妇女发展的关系研究相关的 22 个子课题。2003 年末,全国妇联和中国妇女研究会在北京召开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男女平等理论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共有 100 多名专家参加,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体系的建设展开了讨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见解。2006 年,彭珮云同志在厦门大学参加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性别平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研讨会时明确指出要建设先进的性别文化。2010 年她在厦门大学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当代性别理论发展研讨会”上,要求进一步加强妇女理论研究,努力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她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实践性,能系

统地解释当代中国妇女发展的阶段性、根本任务、主体力量、发展途径等一系列基本问题。2011 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列为重点项目,2013 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与实践》一书出版。书稿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妇女理论的基本原理,系统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思想来源、指导思想、实践基础,以及妇女解放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深刻阐明了推动中国妇女运动,实现妇女的进一步解放与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性别解放理论

面向未来,我们认为在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性别解放理论时要注意以下 4 个问题: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性别解放理论与马列主义经典文本之间的关系。学者们要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两性关系的论述及理解,比如关于人的本质、男女平等、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关于人性的论述,关于阶级、种族/民族、性别等关系的论述,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描述,关于思维与存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关系的论述等,这些宝贵的理论资源都将为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与西方女权主义发展成果之间的关系。学者们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视妇女解放是国家、民族和阶级解放的一部分,注重经济发展对妇女解放的作用,所以妇女发展在实践中表现为在阶级和经济利益取得之后。在他们看来,性别利益与阶级利益是一致的,两者的差异往往被忽视;在实现妇女解放的路径上缺乏对各种社会关系及其之间相互关系的具体论述。为此,在形成 21 世纪具有中国情境的妇女解放理论时,我们要吸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带来的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其对个人自由和机会的尊重,肯定后现代主义解构权力对抗专制的作用,吸收社会性别理论中结合包括考虑影响女性发展的各种因素的各种形式的权力/权利关系来关注妇女的现实状况和需求,强调普遍中的特殊、主流外的边缘,强调倾听另类和弱势族群的声音。在强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批判的同时,更多地关注性别问题。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与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女权主义思想的关系。我们要特别注意研究和借鉴那些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如玛格丽特·本斯通应用马克思的一系列经济概念把家务劳动定义为生产的一种形式,认为无偿的家务劳动构成妇女被压迫的物质基础;劳动力再生产是妇女被压迫的根源;家庭是性别压迫的主要场所等。讨论“家务劳动”是否创造剩余价值,家务劳动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家务劳动能否工资化,对这些问题应该重新进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非经济因素与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研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巴雷特用意识形态来解释性压迫和阶级压迫,强调意识形态在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中的作用。家庭作为基本社会单位,是维持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场所。男女在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和由此建构起来的身份特征正是在家庭意识形态内并通过现实家庭的社会化而建构和再生产的。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结构分析途径,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家庭结合在一起,相互依存,是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真正的性别平等才有可能实现。这些真知灼见在目前的全球政治经济框架下应被重视。

四是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形成与发展中“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关系。21 世纪出现的对于中国妇女/性别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反思,带来对毛泽东时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的理论和实践的思考。面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妇女的双重负担,许多人开始讨论集体主义时期妇女解放的正效应。在制度层面上,当时的妇女大量进入许多以前由男性垄断的行业,创造了妇女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政府提供了托儿所、食堂等解放妇女家务劳动的设施,收入分配上主张男女同工同酬;意识形态上承认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参加劳动,成为生产、革命和建设的

主体。尽管家务劳动仍是无酬的,但是全社会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国家承认家务劳动的承担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给予她们较高的地位甚至国家表彰。但在改革开放后,我们强调个性和差异,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国家和组织的力量退后,女性在家务劳动和生育责任的压力下,以个体为单位自我发展,整体来讲,广大妇女处于较低的职业层次,收入报酬相对男性更低,家务劳动没有报酬,且地位也不被国家所承认。我们是否就能基于此得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是中国妇女解放的黄金时期呢?对此我们要全面分析,事实上观察当时的妇女解放策略及其状况我们可以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女工同样存在性别化的行业分工和职业分工,那个时候能享有单位所提供的再生产福利的只是极小部分的城镇全民女工,而不是所有的女性[3]。面对今天中国妇女生存和发展的现状,我们要认识到男女平等目标实现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同时也要正视妇女解放历史中出现的宝贵思想。对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妇女运动的实践,我们应该挖掘和研究当时众多妇女参与经济建设以及经济意识的培育。那段时期中国妇女较高的劳动参与率、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个人能力的提升、个人主动参与共同体建设的意识等,是目前女权主义运动要汲取的。

总的来说,在中国未来的妇女/性别理论与行动中,我们对新自由主义对妇女发展带来的影响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正视和研究在新自由主义推进的全球化进程中妇女发展所受到的伤害,在自由主义女权之外重建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导下,关注国情,关注现实,了解和解决不同层次妇女的不同问题,扎实推进中国的妇女理论和实践研究。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0.

[2] 江泽民.全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M]//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06.

[3] 金一虹.“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妇女劳动[J].社会学研究,2006(1):173.

Review and Prospect of Women/Gender Theory in China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SHI Hong-mei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0,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stag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gender theory in China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first stage is the formation period of women/gender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between 1978-2000; the second stage is the development period of women/gender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after 2000. Various thoughts and trends in each stage influenced the women/gender theory and thus formed the panorama of women/gender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We need to absorb the theory resource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Some factors with Marxism in western feminism theory should also be our reference. We need to draw lessons from women emancipation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Some propositions proposed by CCP should be concerned especially. Guided by the view on women of Marxism, researchers should continue our research on women/gender emancipation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women/gender theory; women/gender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责任编辑 鲁玉玲)